

XIAMENDAXUE
XINSHIJIJIAOCAIDAXI
厦门大学新世纪教材大系

新 编
中国哲学史

XINBIAN
ZHONGGUOZHEXUESHI

Zhan ShiChuang
詹石窗【主编】

中 国 书 局

厦门大学新世纪教材大系

新编中国哲学史

詹石窗 主编

中国书店

·北京·

责任编辑：赵安民

封面设计：愚 垦

厦门大学新世纪教材大系
新编中国哲学史

詹石窗 主编

出版：中国书店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东街 115 号

邮编：100050

电话：010—63017857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北京市李史山印刷厂

开本：880×1230 1/32

版次：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字数：700 千字

印张：25.75

书号：ISBN 7 - 80663 - 129 - 1/B·117

定价：65.00 元

本版书凡印装质量不合格者由本社调换，
当地新华书店缺售者可向本社邮购。

本书编委会

主 编 詹石窗

主要撰稿人 詹石窗 乐爱国 傅小凡
吴 洲 余章宝

其他撰稿人 (排名不分先后)
姜守诚 林雪燕 何海涛
陈惠平 庄朝兰 杜 伟
严 霞

《厦门大学新世纪教材大系》 出版说明

这是继《厦门大学面向 21 世纪系列教材》出版后我校再次组织编写的一套系列教材，它与前一套系列教材一样，是我校面向新世纪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的成果，是我校更新教学内容、建构人才素质培养的教学新模式的一种实践。

新世纪的到来，把高等教育推到一个新的考验关口，如何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知识、能力和素质整体发展、适应 21 世纪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人才，是关系到国力竞争、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性问题之一，“谁掌握了面向 21 世纪的教育，谁就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战略主动地位”。

面对着新世纪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我们主动将教学工作推向人才培养竞争的前沿，转变教育思想，树立质量意识和素质教育新观念；发扬办学特色，加大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力度；引入竞争机制，激励师生的创新意识和教学改革的积极性，使我校本科教学工作，主动适应社会的人才规格的多样化需求，造就知识和能力都得以充分发挥的高素质人才。在这样的教学改革进程中，我们充分注意到综合大学教育的特点和规律，认真地处理好文化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既反对讲素质教育就不要专业的倾向，也反对不考虑社会需要、忽视社会经济科技迅速变化的情况、固守狭隘的专业教学的老观念、老做法，而着重从两个方面开展教学改革，一是开设跨学科素质教育课程，加大文理渗透的力度，增强学生的科学和人文基础，将文化素质教育作为推进素质教育的突破口；二是结合专

业教学实施素质教育，把素质教育贯彻到专业教育的过程中，通过专业课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扩大专业口径，深厚专业基础。已出版的《厦门大学面向 21 世纪系列教材》正是体现了第一方面的成果，这次组织出版的《厦门大学新世纪教材系列》则是结合专业教学实施素质教育的尝试。所以，这次列入本系列教材的是我校各专业教学计划中的学科基本课程的教材和部分富有特色的选修课教材，它从一个角度体现了我校本科教学的优势和特色。

教材建设是教学工作的一项基础工程，是教学改革和教学经验长期积累的结晶。一部成功的教材，不仅浓缩着社会文明和知识探索，而且给予终身受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学生走向文明进步的阶梯。我们这次组织出版的这套教材，优先考虑的是近几年教学改革的实践成果，即国家教育部或福建省教委立项的“面向 21 世纪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研究”的成果，和那些能反映我校办学特色、学科优势的旧版教材的修订、重编，以及一些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是优秀的讲义。

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把厦门大学办成国内一流、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的社会主义综合大学。一流的教学工作必须产生一批一流的教材。我们组织出版这套系列教材，正是我们朝着这个目标前行的一种努力，也为了让更多的专家学者、更广大的师生读者对我们的教材建设提出宝贵的意见，帮助我们的教学工作更上一层楼。

厦门大学教务处
2000 年 6 月

导 论

【学习目的】 通过追溯古人的山水认识与传统哲学的关系，培养对中国哲学的兴趣，了解中国哲学的性质、研究范围，掌握中国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基本特点，认识中国哲学研究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

中华民族素以悠久历史而闻名于世。在生存与发展的历史进程里，我们的先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这当中，中国哲学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学习中国哲学，无论对于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或者对于个人的思想素质修养而言都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如何进入中国哲学的宏伟殿堂呢？立场不同，路径也就存在许多差异。不过，有一种不可忽略的事实，那就是：此等凝聚着先民生存智慧的传统哲学在相当程度上乃与山水结下了不解之缘。假如我们能够透过思想符号中的山水性灵来思索中国传统哲学的内蕴，那将是别有一番情趣的。

一、中国哲学与山水性灵

翻开古典哲学论著，我们时常可以看到我国先哲对于山水的评论，感受到他们所描述的山水氛围。读过孔子《论语》的人，应该不会忘记他在书中所说的一句至理名言：

✓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论语·雍也》）

孔子不仅说山道水，而且还进行哲学审视，引出了“动”与“静”的辩证概念。孔子后学孟子也是一个对山水极感兴趣的大学者，他对孔子的话进行一番阐释和演绎：

徐子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

者如是，是之取尔”。（《孟子·离娄下》）

如果说孔子有关“山水”的言论还相对较简单的话，那么孟子则对山水赋予了更深刻的哲理意义。孟子对“山水”的这种解读方式深深地影响后来者。以后的人们往往喜欢以山水为媒介来抒发性情，从而把士大夫的人格上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例如荀子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说：

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处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洗洗乎不涸尽，似道。……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荀子·宥坐》）

就孔子与学生子贡对于“水”的一段对话，荀子在这里虽然没有更多的赞叹之词，但从其描述的字里行间却可以看出荀子对孔门师徒那种乐于山水的情趣是颇为首肯的。

在古代士大夫哲学家心目中，“山水”是一种象征，更是一种符号。心灵情感可以借助这种独特的自然符号而得到抒写。广义的山水当然不止是抽象的类概念，它们应该具备诸多具体内涵，像生长于山水中的草木虫鱼、飞禽走兽等等都可以作为心灵的代码、思想抒发的凭借。于是我们看到了邹衍“阴阳五行”理论建构过程中山水名胜的映射。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谓：

（邹衍）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太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在邹衍哲学框架中，山水得到了进一步的演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宇

宙图式。难怪两千年后乾隆皇帝看了这篇文章会大为赞叹，称邹衍所描绘的山水宇宙景观“若造物施設也”（《日下旧闻考》卷十八）。

由上述诸例可知，中国古代哲学家不仅喜欢山水，而且他们的思想也颇受山水灵性的启迪。这就是笔者为什么说学习中国哲学史要以山水符号作为入门途径的一条理由。

当然，反过来看，假如我们有一定的中国哲学素养，再去游山玩水可能就会对自然景观的符号有更深一层的领悟。郑缉《东阳记》曰：“北山有湖，故老相传云：其下有居民曰徐公者，常登岭至此处，见湖水湛然，有二人共博于湖间。自称赤松子、安期生。有一壶酒，因酌以饮徐公，徐公醉而寐其侧。比醒，不复见二人，而宿草攢蔓其上。家人以为死也。丧服三年。服竟，徐公方反。今其处犹为徐公湖。”（欧阳询《艺文类聚》第16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一版）这个记载暗示着一种超越淡远的理念。再看宋谢灵运《石壁还湖中作》诗云：“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淡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菱荷迭映暖，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欧阳询《艺文类聚》第169页）从这首诗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士大夫对中国哲学追求自然神韵的熟练掌握。

追索往古，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文化本来就有一种山水性灵，而这种性灵最终则凝聚在传统哲学里边。所以我们透过山水可以更好地领悟中国哲学的思想旨趣，而当我们有了这种领悟的时候再反观山水就能够对其灵动的美有直觉的沟通。这就是笔者为什么要从游山玩水谈起的原因。

二、中国哲学史的范围和任务

我们刚刚对山水进行了一番“神游”，力图从中找到中国哲学的某种“元精神”。对山水的观想与领悟确实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古人的哲理智慧；不过，笔者的意思并非叫大家成天沉浸在山水游览中而不知所以。作为读书人，我们自然必须掌握一定的书本内容，关于中

国哲学史的学习与研究也是如此。

正如其他学科的探索需要明白其研究对象一样，我们学习与研究中国哲学史也应该了解它的范围和任务。但是，范围与任务问题又是与中国哲学的定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又必须对中国哲学的定义有一个大体的思考。

要对中国哲学下一个准确的定义，这当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所以，我们阅读前人关于中国哲学史教科书或者探究中国哲学的著作，几乎是很难发现有关中国哲学定义的文字，即使是中国哲学的大师级人物，诸如冯友兰、张岱年先生，他们的著作也不明确地说出中国哲学的定义是什么。然而，作为一门学科，对其最基本的核心概念下一个定义却又是必须的。

如果按照以往的一般原理来看中国哲学，那就可以轻易地说：所谓中国哲学那就是中国人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但是，这似乎过于笼统。根据多年的思考，笔者觉得这个定义可以这样下：

中国哲学是中国人对宇宙现象与人的生存原则的一种领悟和把握，并且把这种领悟与把握的基本精神贯彻于实际践履之中所形成的一门学问。

所谓“领悟”不能等同于“观”或者“看”，但毫无疑问则又是以观看、感觉为前提的。这就是为什么古代哲人喜欢山水世界的奥秘所在。在古人心目中，山水是面对的最直接的宇宙存在。由此伸展开去，那就可以观天文，察地理以及鸟兽虫鱼，还有人自己。在这种观察过程中和观察之后伴随着一连串的思考，最终达到了领悟，并有了整体的把握。这样一来，中国哲学就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整个传统文化休戚相关的。只是这种领悟与把握带有整体性的智慧。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古代哲人向来注重践履，所谓“践履”实际上就是行动。因此，中国哲学可以称作行动的哲学。从内心修养行动到外部行动。在行动中不断总结，就是不断地领悟，于是就有了“道”。这个“道”包含了天道、地道、人道，它们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天道、地道属于自然之道范围。在古代，有所谓“天地相应”之说，以“地”归属于“天”。这样，天道又可以涵盖地道。因

此，一般说的天道也就包括了宇宙自然之道，当然也关涉地道。而人道则主要是关于人的心性与社会生存准则的道理。张岱年教授曾经说：“天道人道的探讨，最终归结为治道。”（张岱年：《中国哲学发微》第202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他又引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话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但是，什么是“治道”？人们的理解并不太一致，也不可能一致。我们以为，治道至少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治身，就是关于自我身心的认识与内省修养；二是关于治世，就是关于社会的治理。①前者可视为人生哲学或者称为生命哲学，②后者则可视为社会政治哲学；而上述的天道、地道则可视为自然哲学。③

另外，还应该考虑的是，由于所处时空的不同和条件的差异，古代的人们对于客观存在的领悟又是有差别的。上古时期，自然界在先民们面前曾经具有很大的神秘感，于是形成了种种神话和神化观念，这些可称之为“神道”。《周易·观卦彖传》曰：“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意思是说：观照大自然运行的神妙规律，就能理解四季交替毫不差错的道理；圣人效法大自然的神妙规律而设教于天下，万民于是纷纷服从。“神道设教”虽然是一种宗教行为，但在具体运作与“领悟”过程中又蕴含着某种哲学理念；即使那些看起来“荒诞不经”的神话传说也反映了先民的某种思维方式，都可以包括在“神道”的范围之中。关于“神道”的问题，我们可以看作宗教哲学。④

当我们明白了什么是中国哲学时，中国哲学史的范围和任务也就比较好确定了。所谓中国哲学史，就是中国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变化的历史。大家知道，哲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认识问题。我们说“领悟”，归根结底是一种认识，这就是哲学的基本对象，中国哲学史也是这样。可以说，一部中国哲学史就是中华民族的思想认识史，亦即对天体自然及人自身领悟的历史。这种领悟的最终形态是精神飞跃，即达到了抽象思维的最高成就。每一个阶段都有精神飞跃，因此也就有了各个阶段的哲学。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各个民族的文化呈

多元状态，诸如文学、音乐、建筑、绘画，等等，都是其文化的组合因素。如果说，这些文化形态是以相对具体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么哲学形态则表现为抽象概念范畴的建立和应用，尽管这种抽象概念范畴也是符号化的，但在信息运转上则与其他具体的文化形态有很大的不同。我们考察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就应该主要把握住这个基本点。

数千年的中国哲学史包含极为丰富而庞杂的内容。我们的研究既要对其基本的文献进行考察整理，又要总结其发生、发展规律。而更为重要的是要发掘那些有价值的合理内核为未来人类的认识与生存服务。这就是我们探究中国哲学史的任务。

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中国哲学史当然也应该建立自己行之有效的办法。关于这个问题，许多学者已有不少论述。其中最有影响的要算阶级分析方法与理论分析方法。回顾往昔，我们可以发现，以往的教科书或者中国哲学专著在这种方法的使用方面的确是弓马娴熟的，人们力图把阶级分析与理论分析结合起来，并且在实施过程中也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毋庸置疑，任何一种方法假如发展到了滥用的地步，那就会走向反面。中国哲学的研究在这方面的教训是记忆犹新的。由于阶级分析方法的滥用，长期以来，学术界受到了种种污染，什么“评法批儒”、反击右倾翻案风，许多原为学者的人士在搅进漩涡之后不可避免就犯了绝对肯定与绝对否定的机械错误。鉴于历史的教训，我们本课在开始之际拟对方法问题略作说明。

总的观点是，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哲学史研究应该遵循科学精神，这就是大胆探索与尊重事实。著名科学家黑韦特（Paul G. Hewitt）在《概念物理学：对于你的环境的新介绍》一书中说：“如果一位科学家认为某个想法是正确的，而随后又发现了任何相反的证据，他就会修正这一想法或完全放弃它。按照科学的精神，不管提出这一想法的人有多高的名望，这一观点都必须修正或放弃。”黑韦特这段论述告诉我们这样两条道理：首先，科学研究必须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

客观的事实是任何一种理论的最好审判者。事实胜于权威。任何科学家都必须接受客观事实，哪怕这种事实与自己的想法相违背。其次，科学研究还必须具有怀疑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就不可能有超越和突破。固守某种一成不变的旧教条，只能把自己封闭起来。

当然，我们说科学研究必须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大胆探索的精神，这并不意味着只有这两条就能够获得真理，取得研究的成功。历史事实证明，当一位科学家进入具体研究领域时，除了必须具备上述一般科学研究原则和态度外，他还必须寻求一种适合于本学科的具体研究工作的稍微具体一点的原则和方法。从这种立场出发，我们以为中国哲学史研究还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 坚持文献性与逻辑性的统一

所谓“文献性”就是说必须充分占有史料。乍一看来，这似乎是从理论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其实不然，因为广义的事实不仅指具体的试验、实验观察到的大自然的物质存在，而且还应该包括历史的思想资料的记录等等。对于自然科学家来说主要是注重前者，对于社会科学尤其是历史科学来说主要是注重后者。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不是直接的自然界，而是古代哲人所创造的意识形态，他们所领悟到的哲理的保存形式就是传统文献，这些文献构成了本学科研究的主要事实。如果不能占有文献，那么建造起来的理论就只能是一种空中楼阁，经不起历史和未来的检验。所以，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我们必须强调其文献性，这就是尊重事实在这一领域中的具体贯彻。

不过，只看到了文献，仍然不能够发现中国哲学史的规律，把握其本质。因此，在占有文献史料的基础上，还必须努力寻求蕴含于其中的内在逻辑。在众多文献面前，如果没有理论思维，没有逻辑把握，那就会被淹没在文献的海洋之中而不能到达科学的彼岸。所以，我们不但需要驾驭文献的功夫，而且还必须理清文献的逻辑进程；不但要理清一部具体文献的逻辑进程，而且要理清众多文献之间的逻辑关系；不但要理清各种文献的纵横交错的逻辑关系，而且要通过研究，建立起自己的一套逻辑叙述体系。

(二) 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的一致

在中国哲学中，就个别典籍来说，是由个体创作的，体现了某一个体的思想，是某一个体的心灵轨迹；就整体而言，又在一定层次上一定深度上体现了全民族的某一方面的集体精神或者集体潜意识；但不管从个体而言还是从集体而言，中国哲学乃是历史的产物，它们在一定历史时期产生且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人们的精神理念。所以，我们绝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来进行抽象研究；相反，必须将之置于一定历史时期的生产、生活状态中来加以考察。

另一方面，这种研究还必须具有时代性。历史性与时代性，这两个方面既相区别，又相统一，是相辅相成的一点两面。只强调历史性，而忽略了时代性，那就不会有超越，不会有发展。那么，什么叫做“时代性”呢？这不是对古人进行任意的曲解，而是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站在时代科学的高峰作出具有时代科学精神的考察和思索。这就是说，一方面要理解古人，还古人本来的历史面目；另一方面，又要揭示其现代意义。“解读”往古与“揭示”现代意义，这是相互联系的工作，但又不能以自己的意愿代替古人的领悟与思考。

(三) 坚持整体把握与局部具体分析的有机结合

整体把握与局部具体分析，这也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局部具体分析离不开整体把握，而整体把握又必须依赖局部具体分析才能显示出其固有的功能。因为一个事物，如果我们不正视其整体意义，只是对其局部进行分析，那就只能得出片面结论。反之，如果我们不对某一事物的局部一一进行剖析，而只是笼统概括，那又会流于“浮光掠影”。整体把握与局部具体分析也具有相对意义。我们应该从多层次上来考虑这种方法的有机结合。

整体把握与局部具体分析是相对的。如果我们从历史长河的远距离观点上来考察中国哲学，那么其整体的涵盖面就是从上古至现代有关这一问题的发展总线索，而某一时代的哲学面貌之考察则是局部；如果我们把时限规定在某一时代之内，那么这个时代内的哲学面貌就成为整体；再从文献角度看，若以从古至今所有哲学文献为整体，则

时间
文献

某一派别某一具体的经典便是局部。若以某一经典为整体，则经典内某一章节则为局部。如此亦可知，整体与局部又是相互关联的。我们在进行研究时不能不从具体出发，但作为阐述体系的建构则又必须尽可能保持其整体性。

（四）坚持中国传统方法与外来方法并举

在当今世界上，由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革，任何一种研究都不可能是自我封闭的，尤其是随着东西方交往的发展，许多西方的科学研究方法正在逐步地传入神州本土。在这种气候下，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问题就有可能像其他一些领域那样出现极端；或者由于对西方文明的抵触，只采用中国传统的考据、训诂之类方法；或者由于“全盘西化”观念作怪，极力排斥传统方法。我们认为，这两种极端的方式都不利于对中国哲学的真正把握，不利于发掘其中各方面的价值。我们主张，应该坚持中国传统方法与外来方法并举。

几千年来，我国先民在文化建设方面形成了许多独特分析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训诂章句之学的方法与考据学方法。在今天看来，这种方法依然不能废弃，因为中国哲学文献是以汉语言为主要记载手段的，确切地说，这主要是以古代汉语为表达工具的。所以，如果我们不懂训诂与考据，就不能正确理解古人的思想。但是，我们也不排斥外来（主要是西方）的一切有利于正确有效研究的方法。这是因为社会文明的发展本身就是互相渗透的，所以应该互相借鉴。我们必须正视西方科学界具有重要影响的那些研究方法，这包括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为人们所熟知和称道的文化人类学、符号学、比较学方面的方法。我们认为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的适当引入可以使具体分析更加具有层次性。

四、中国哲学史的分期与基本特点

作为一种思想史的学科，中国哲学史自然必须考虑历史分期。本课程所要探究的主要是古代的东西，其上限起于神话哲学之发端，其

下限则截止 1949 年。大体分为五段：一是先秦时期，二是秦代至南北朝时期，三是隋唐五代时期，四是宋元明至 1840 年鸦片战争时期，五是 1840 年以后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期。这五个阶段的划分与中国古代历史进程基本是一致的。这样考虑便于结合具体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等各个层面来进行考察分析。

中国哲学史的特点与中国历史密切相连。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在论述中国哲学史的特点时指出：“中国社会历史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哲学史的特点，正像欧洲社会历史的特点决定欧洲哲学史的特点一样。”（见《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第 12 页，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根据这个前提，该书得出了以下三大特点：（1）封建社会的哲学历史最长；（2）神学化了的儒学占有极大优势；（3）有光辉的唯物论和无神论传统。这三个特点是从中国哲学史的内容方面考虑的。另外，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古代哲学的几个特点》一文中也对这个问题进行总结。他认为，中国哲学的特点就是中国哲学的民族特点。又指出，中国哲学的特点实际上乃是中国的大多数思想家所共同而与别国的大多数思想家不同的特殊倾向或特殊形态。从这个前提出发，张先生也提出了四条作为中国哲学的基本特点：（1）本体与现象统一的观点；（2）生活与思想一致的传统；（3）在唯物主义方面，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相互结合的传统；（4）生死自然的观点与无神论在哲学发展中的深刻影响。此外，张先生考虑到中国哲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套独特的基本范畴、基本概念，还有一些特殊提法^①。

我们以为，上述的总结都是在理的。与此同时，这也表明，从不同角度来观察中国哲学史，可以发现不同的特点。故而，我们也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思索。其出发点是从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来考察，把这种考察置于“相对突出”的衡量准则之下。所谓“相对突出”这是比较而言的，只要在某个方面比别的民族、别的国度突出，那就算是特点了。根据这种思路，我们认为下列几条也可以当作中国哲学史的特点：

^① 有关张岱年先生的见解详见《中国哲学发微》一书第 41 页。

(1) 对人类生存特别关注。“生存”两字看起来简单，在富足安乐的环境里，这似乎更显得微不足道；但是，从历史层面看，这两个字却凝聚着相当厚重的蕴涵。在宇宙空间里，生存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环境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人的生存当然也不例外。在人类必须与外界较量体力的时候，人类比其他动物并没有什么优越性，甚至要时刻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威胁，这使人类从一开始就怀有一种异己的恐惧感。当人类以其智力战胜了其他动物，在自然界取得统治地位的时候，人类生存竞争的对象发生转移。随着私有制与国家的形成，人类竞争对手主要不是来自其他动物界，而是人类自身。于是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连连不断。人类面对着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压力。关于这一点，可以说，古今中外的人类都是共同的。然而，相比而言，中国先民有一种对于生存问题的特别浓厚的忧患意识。这不仅体现在原始神话传说中那些与洪水猛兽搏斗的故事里，而且反映在古老占卜文献关于命运的那些预测言辞中。无论是从商周甲骨卜辞还是从《易经》卦爻辞，我们都可以发现先民们对于生存险境的特别敏感性。或许是古老忧患神话基因的续传，到了封建社会鼎盛发达时期，我国哲学家依然有着鲜明的生存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集体性的特质。也就是说，我们的古代哲人常常是为“类”的存在与发展而担忧，连孔子都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此等忧患意识从根本上看当然还是源于生存问题。不过，必须指出，先民对生存问题的关注，并非仅仅体现为忧患意识而已；实际上，先民在忧患的同时也萌动着兴旺发达的愿望。许慎《说文解字》谓：“生，进也，象草木生出土。”就字形结构看，“生”字下像“土”，上像“出”，合之以表征出内而外、进展兴盛。此等积极的生存理念在《周易》里发展为“生生之谓易”以及“自强不息”的精神。在数千年的历史延续中，正是此等独特生存精神鼓舞着先民们前赴后继，奋斗不止。进入到意识形态领域，我国哲人们也同样在此等精神激励下不断耕耘，以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寄托深沉的生存智慧，创造具有民族特征的生存境界。

(2) 道德哲学与宗法制度紧密相关。众所周知，中国素有礼仪之邦雅称。与之对应，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也是相当厚重的。所谓“上下